

婚姻的除籍——一项关于制度形态跃迁的发生学研究

当婚姻不再垄断生育、经济、安全与身份，它并非简单消失，而是第一次被迫回答：除去功能之后，两个人为何仍愿意共同生活？

王德生 · 婚姻幸福专栏 · 约 3.1 万字 · 2026年7月24日

摘要

当代婚姻困境的实质，不是维持其自明性的外部社会条件撤出了，也不是婚姻的功能被市场替代，而是婚姻自身正在经历一个更根本的结构性事件：它正从一种“被外部结构强行安置的默认状态”中脱落出来。本文追问一个被既有解释视为给定前提的问题——前现代婚姻的“自明性”，究竟建立在“人们真心信它”之上，还是建立在“人们无法承受不信它的代价”之上？通过对家庭史材料的重新审视和对“不能不信”的结构性约束的指认，本文提出“除籍”这一概念，命名制度的绑定形态从“无需主体同意便自动获得”沉降为“必须由主体亲自认领与建构”的变迁过程。除籍的发生，是生命时间的个体化、社会网络的收缩、意义生产的下放——这三重现代化的推力同步撤除至临界点后的必然结算。在此框架下，本文重新分析了当代婚姻的悬置状态、制度韧性、善与美的分离，并以日本“未婚化”进程为案例展示除籍的非均匀运作。生成式AI在此进程中不是除籍的原因，却以善的极致降解与美的廉价量产加速了悬置状态的暴露，同时充当了一面高分辨率的镜子，迫使不可替代的核与可替代的壳第一次被清晰地分开。本文的贡献，不在为婚姻提供出路，而在命名一个此前虽被反复描述却未被精确指认的发生学事实：婚姻正在被除籍。这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第一次面临着在无外部强制兜底的条件下亲自建构深度关系的任务——不是修复旧制度，而是学习一种此前从未被要求过的能力。

关键词：婚姻制度；除籍；制度形态跃迁；个体化；发生学

一、引言：一个问题与它的岔路

1.1 一个被追问了四十年却尚未被精确提出的问题

过去四十年间，关于“婚姻陷入危机”的论述，出现过两次关键的诊断升级。这两次升级每一次都让理解深入了一层，但每一次也都在同一个预设上停住了脚步。

第一代诊断可以被称为功能替代论。它的核心判断简洁而有力：婚姻作为一个多功能复合体——经济合作、日常照料、情感慰藉、育儿支持、社会身份——正在被平台经济、服务业外包与数字技术

逐项解构。外卖替代了做饭，家政替代了家务分工，交友软件替代了配偶作为情感出口的独占性，托育机构替代了祖辈的育儿功能。当替代率越过某个阈值，婚姻便丧失了其存在的实用基础。这一诊断正确地看到了婚姻的历史构成方式——它的确曾经是一个被功能捆绑在一起的复合体。但它被一个经验事实卡住了：许多功能已被高度替代的婚姻，至今没有消失。它依然被大多数年轻人渴望，依然作为“幸福人生”的理想类型占据文化想象的中心。

第二代诊断由此登场。本文称之为自明性撤出论[1]。它的核心判断是：婚姻的存续不主要依赖功能的不可替代性，而依赖它曾被全社会“认真地当真”。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婚姻不是一个需要论证其合理性的“选项”，而是一套不言自明的默认配置。当代困境的实质，不是功能被替代，而是维持这种“自明性”的三重社会条件——时间结构的整合、社会网络的整合、意义生产的整合——正在系统性地撤出。当这三重条件瓦解，婚姻便从“自明制度”滑入一种悬置状态：它在形式上存续，但不再被所有人当真。

这第二代诊断比第一代深了一层。它不是问“婚姻的功能被什么替代了”，而是问“婚姻为什么以前不需要论证、现在需要了”。但本文要指出的是：它仍然有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这个预设是——婚姻的自明性曾经建立在“人们真心信它”之上。

正是在这个预设上，两条解释路径都没能继续追问下去。功能替代论关心的是“婚姻有什么用”，自明性撤出论关心的是“人们还信不信”。但两者共用一个前提：那个曾经坚固的婚姻制度，其坚固性总得有个来源——要么是功能，要么是信念。本文要做的，恰恰是挑战这个前提。

1.2 本文的问题

本文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但它必须被精确地提出，而不能被模糊地感受。

这个核心问题不是“婚姻为什么陷入危机”——这是过去四十年的标准问法，它预设婚姻曾经有一个健康的正常状态，现在偏离了它。这个问法本身就把分析锁在了一个窠臼里：你只能去描述危机、诊断病因、寻找出路。

这个核心问题也不是“婚姻会不会消亡”——这是本质主义的问法，它预设婚姻有一个“本质”可以被消亡，分析的任务是判断这个本质的存续状态。

本文的问题是：那些曾经使得“不进入婚姻”成为一个不可承受的选项的结构性力量，在现代条件下是如何被一条一条地拆除的？以及，当它们被拆除之后，婚姻这个制度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质变？

这个问题不是问“婚姻怎么了”，而是问“使婚姻成为婚姻的那个外部结构怎么了”。它不是问“人为什么不信了”，而是问“那个曾经让人不能不信的东西去哪儿了”。它不是诊断，是追问。

这个问题一旦被认真对待，就会把分析引向一个此前被反复擦肩而过却从未被精确指认的发生学事实：婚姻正在经历除籍——一种制度形态的跃迁，而非制度功能的衰变。

1.3 本文的结构

本文分六章。第一章引言，界定问题与既有解释的局限。第二章给出“除籍”的正式定义，完成与邻近概念的切割，并界定其与“个体化”理论的关键区分。第三章以历史材料论证除籍的判断基础——前现代婚姻的自明性建立在“不能不信”而非“当真”之上，进而梳理拆除这种结构性约束的三重现代化力量。第四章分析除籍之后的婚姻状态：悬置、善与美的分离、以及制度的韧性。第四章附论以日本“未婚化”进程为案例，展示除籍的非均匀运作。第五章分析生成式AI在除籍进程中的位置。第六章结论，总结除籍的理论贡献，讨论不可逆性与新任务，并明确证伪条件。

二、除籍：一个发生学概念的界定

2.1 什么是除籍

“除籍”在本文中是一个专有名词，不是隐喻。它借用户籍制度中的“除籍”一词——一个人从一个预设的、无需同意便被归入的“籍贯”中被移出——来指称一种精确的社会制度变迁形态。

一项制度处于“在籍”状态，指的是：社会成员对该制度的参与，不依赖于个体对该制度的自主同意与主动选择，而是由一套外在于个体的结构性力量——经济必需、社会制裁、文化不言自明、亲属网络压迫、生命历程脚本——所强制安置。个体无需“决定进入”，因为“不进入”从未被感知为一个可操作的可选项。在这种状态下，制度是默认的、继承的、被给定的。人们不是“选择”了它，而是从未被给予“不选”的自由——不是因为有人在暴力禁止，而是因为“不选”的代价大到不可承受：一个人不进入婚姻，就意味着丧失经济安全网（在家庭是唯一保障的前现代）、丧失成年社会身份（在许多传统社会，未婚者不被视为完全的社会成员）、丧失被文化承认的完整人生。

一项制度发生“除籍”，指的是：维持其“在籍”状态的那些外部结构性力量，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弱化、瓦解或被其他结构替代，从而使该制度的参与从“被强制安置的默认”沉降为“必须由个体亲自认领的选项”。除籍不是制度本身的变化——它的法律条文、组织架构、仪式流程可能一字未改。除籍是个体与制度之间的那个中介层的撤除：曾经有一张外部结构的大网，把个体从生下来就兜在制度里；这张网撤了，个体和制度便第一次直接面对面了。面对面意味着：你现在得亲自对它说“要”或者“不要”——而“亲自说不要”在在籍状态中是结构上不可执行的选项。

这里需要强调一个容易滑过的区分：“在籍状态”不等于“制度强迫每一个人进入”。“在籍”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不进入的代价被维持在一个不可承受的水平上。在传统社会，一个人可能厌恶婚姻、逃避婚姻、口头上反对婚姻，但只要“不结婚”意味着被拒绝在成年人的经济与社会参与之外，他在实际行动上的选择空间就几乎不存在。因此，在籍状态在经验中往往呈现为“几乎所有人都结了婚”，但这

不等于“几乎所有人都信婚姻”。一个是结构效果，一个是认知状态——把前者误判为后者的证据，正是自明性撤出论滑入误区的那一步。

所以，除籍有三个不可化约的特征：

第一，不可逆性。除籍一旦发生，那张曾经兜住每一个人的外部结构之网，不会自己长回去。这一判断不是基于对现代化进程的单向决定论信仰，而是基于一个发生学的事实：拆除这张网的那些力量——个体化、市场化、数字化、思想的去权威化——之所以能拆除它，恰恰是因为它们解除了这张网赖以附着的那些前现代条件。前现代条件是什么？是经济互赖的不可替代性（家庭是唯一的安全网）、是社会身份的不可选择性（不结婚就没有成年身份）、是生命脚本的唯一性（没有婚外的人生范本可供想象）。这三个条件一旦被现代制度（劳动市场、福利国家、教育扩张、个人权利话语）系统性地瓦解，网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底。网不是被“撕破”的，而是脚下的地基被整块替换了。地基换了，网不可能自己长回去——因为长回去需要那些已经被替代的前现代条件重新回来，而这正是现代化不会反向运行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再籍化”完全不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新的结构性强制——比如算法化的婚恋匹配平台垄断了择偶通道，或者某种新的财产制度使不进入婚姻者在法律上遭受系统性惩罚——可能出现。但那不会是旧网的复原，而是新网的编织。旧网的不可逆，在于它的土壤已被置换；新网的可能，在于新土壤上可以长出新的植物。本文对“不可逆”的判断，限于旧网形态的不可复原，而不切断未来新形态强制出现的可能。

第二，非均匀性。除籍不是一个全国统一时点、整齐划一发生的事件。它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群体中的进度不同。在某些社区和阶层中，那张网——亲属压力、经济互赖、社会舆论——仍然残留着相当的力度，使婚姻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在籍”残余。而在大城市的中产知识阶层，除籍几乎已完成。这种非均匀性本身就构成了当代婚姻话语撕裂的深层根源：一部分人仍然活在残网中，认为“人人最终都要结婚”；另一部分人则站在除籍后的空地上，发现那个“人人”已经不存在了。非均匀性不是除籍的“不彻底”，而是除籍本身的特征——因为拆除网的现代化力量本身就是非均匀展开的，它们在空间、阶级、文化中的渗透速度不同，自然导致网的不同区域在不同时间点断裂。

第三，被误认为信念危机。除籍发生后，个体不再被外部结构推入婚姻，婚姻的进入变成了一个需要“亲自决定”的事项。这个“亲自决定”，在除籍前的世界中从未被要求过，因此绝大多数人缺乏做这种决定所需的内在资源——他从未学过如何在没有外部脚本的条件下，建构一段足够坚实的关系叙事。当他发现自己“做不了这个决定”时，他误以为是自己不够成熟、不够勇敢、不够爱。他不知道，他正在面对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任务：在没有网兜底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建一个家。除籍让他恐慌，但他把恐慌安错了病因——他以为是“婚姻不再吸引人”，其实是“婚姻第一次从强制变成自由，而自由天然伴随着焦虑”。

2.2 除籍不是什么：与邻近概念的切割

为了确保“除籍”不被误读为一个已有概念的伪装翻新，必须逐一进行切割。

除籍不是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指的是：一项制度的规范正当性被公众质疑，从而失去自愿服从。但除籍指向的事件维度不同：它不是一个“人们开始质疑制度对不对”的认知性事件，而是一个“制度不再能强行安置个体”的结构性事件。在除籍发生之前，人们可能早就质疑婚姻的正当性了——文学史上满是对包办婚姻的控诉、对婚姻不幸的哀叹，从中世纪的法国fabliaux到明清小说中的怨偶叙事，质疑从未断绝。但质疑归质疑，人们仍然进入婚姻，因为不进入的代价大到不可承受。除籍的实质不在于认知层面的“不信”，而在于结构层面的“可以不信了”——不信终于成为一种在现实中可被执行的选择。

除籍不是功能替代。功能替代论看到的是：当婚姻的功能被外部服务逐项取代时，婚姻丧失了实用价值。但除籍看到的是另一个维度：在功能被替代之前，那张强制安置个体的外部结构之网——亲属网络、社会时钟、经济互相依赖——就已经在退化了。功能替代加速了除籍的进程，但除籍的根动力，不是技术，而是现代化对传统社会整合机制的系统性拆解。外卖能让你不结婚也能吃饱——这件事只有在“不结婚”本身已经是一种可承受的选择时，才构成威胁。而“不结婚”变得可承受，恰恰是除籍的先决条件。如果一个人仍然无法承受“不结婚”的社会代价，那么即使有再多的外卖App，他仍然会结婚——他不是“用外卖替代配偶”，而是在“承受不结婚的代价”这个更底层的层面被约束着。功能替代论的盲区正在于此：它没有区分“替代的动力”和“替代生效的条件”，误把后者当成了前者。

除籍不是世俗化。世俗化指的是宗教权威从公共领域退场、信仰变成私人事务。除籍确实包含意义的去权威化——当教会、祖先、宗族不再能为婚姻提供终端句时，意义变成了个体的私人任务。但除籍比世俗化多了一层结构性的维度：即使在宗教权威尚存的传统社会，婚姻的“在籍”也不全靠宗教——它还靠经济互赖、亲属强制、生命脚本的无选择性。除籍是一种比世俗化更底层的结构变迁：它不仅撤除了“天”对婚姻的背书，更撤除了“地”——那张由物质条件、社会关系和生命时间表织成的兜底大网。

除籍不是“去制度化”。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 2004）提出的“婚姻去制度化”概念，已经在当代家庭社会学中占据重要位置。去制度化的核心论点是：规范婚姻行为的那些共享社会规范正在弱化，人们不再遵循一套统一的标准来组织他们的婚姻生活，而是各自即兴发挥。这是一个关于规范弱化的诊断：行为的多样化了，是因为管行为的规则失效了。但除籍诊断的是另一层：在规范失效之前，甚至在其之下，是绑定力的撤除。规范管的是“你应该怎样做”，绑定力管的是“你能不能不做”。去制度化解释了为什么婚姻内部的安排变得多样化了——同居、分居、开放式关系各行其是。除籍解释的是为什么进入婚姻这件事本身从一个自动发生的默认变成了一个需要论证的选择。这两者可以同时发生，但不能相互还原：一个制度可以既被去制度化（人们不再按统一规范运行它）却仍在籍（人们仍然被结构性地推入它），正如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婚姻内部规范在松动，但结婚率仍居高不

下，因为不结婚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不可承受的选择。同样，一个制度可以被除籍——人们不再被自动绑入它——但内部仍存在强大的规范残余。这两条轴线交叉出的四个象限，远比单一的“去制度化”叙事更能精确描述不同的社会状态。

除籍不是“个体化”。这是最关键的一笔切割。乌尔里希·贝克及其合作者的“个体化”理论（Beck & Beck-Gernsheim, 2002），已对现代性如何使个体从传统结构（阶级、家庭、性别角色）中“脱离出来”做过系统论证。个体化的核心命题是：在前现代，个体的生命轨迹被传统结构预先决定——你生在哪个阶级就过哪个阶级的生活，生为女人就必然进入婚姻与母职。而现代性通过福利国家、教育扩张、劳动市场流动，将这些传统结构逐一松绑，把个体从“给定的命运”中释放出来，迫使其成为自身生活的“选择者”与“建构者”。贝克同样分析了生命时间的碎片化、社会网络的收缩以及意义生产的私人化。

既然个体化理论已经如此完备，“除籍”这个概念增加了什么？

回答是：个体化描述的焦点，始终在个体——个体如何从结构中脱嵌，个体如何被迫成为选择者，个体如何承受这种自由的负担。但“除籍”的焦点，在制度。它描述的，不是个体状态的变化，而是制度与个体之间绑定关系的形态从一种状态跃迁到另一种状态。在“在籍”状态，制度与个体之间存在一种“默认绑定”：个体无需主动选择、甚至无需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制度里，制度就已经把他登记在案了。在“除籍”状态，这种默认绑定被解除，制度变成了一种需要个体主动认领的东西。

这个区分不仅仅是视角的微调。它打开了一个个体化理论无法打开的观察维度：制度的绑定力的历史变迁。个体化说“人变了”——从被决定的人变成了选择的人。除籍说“制度变了”——从绑着人的制度变成了等人选的制度。前者的分析单位是个体的生命历程与身份认同，后者的分析单位是制度与个体的绑定关系形态。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贝克的个体化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个现代女性为什么不再自动进入婚姻”：因为她接受了高等教育、有了独立收入、可以独自在城市生活——她作为一个个体，从传统的女性生命脚本中脱嵌了。但“除籍”解释的是另一件事：“婚姻作为一个制度，为什么失去了对整整一代人的默认绑定力”。不是因为这一代人都突然觉醒了、都脱嵌了、都变成选择者了——而是因为制度本身的绑定机制——那些让“不进入”不可承受的结构性约束——在现代条件下被系统性地瓦解了。即便一个人并没有经历个体化的典型路径（比如，她并没有上大学、并没有独立职业、仍生活在传统社区），她所面对的婚姻也已经不是一个完整“在籍”的婚姻了，因为曾经兜住她的那张网已经整体性地变薄了。个体化无法解释这种“网本身的退化”——因为它只关注个体从网中挣脱出来，而不关注网自己也在风化。

这就是“除籍”作为一个概念的不可还原的理论收益：它命名的是一个“制度状态”的变迁，而非一个“个体状态”的变迁。这个命名意味着，当我们分析当代婚姻时，不能仅仅看“人们还信不信”“人们还选不选”，而要看“制度是否还拥有那种无需人们相信就能让人进入的绑定力”。如果这种绑定力在现代

条件下已被系统性地拆除，那么，即便某个个体主观上仍然“信”婚姻，他所进入的也是一个已经被除籍了的婚姻——一个需要他亲自认领、亲自维持的婚姻，而非一个自动接纳他的婚姻。这种婚姻与“在籍婚姻”是两种不同品种的关系，尽管它们共享同一个法律名称，但它们的运行生态已经完全不同了。

2.3 如何识别除籍：四个信号

一个制度正在经历除籍时，社会表面会出现哪些可被观察的信号？本文提出四个识别指标。

第一，论证的焦虑。在除籍发生前的在籍状态中，人们不必论证自己为什么要进入婚姻——就像人不必论证自己为什么要呼吸。在除籍完成后的状态中，如果一个人最终决定不进入婚姻，他也不需要为“不进入”提供论证——因为他不需要为“不做某件事”提供理由。论证恰恰密集出现在除籍的中途：当外部结构不再强行替你决定，但文化惯性仍然在给你施加“你应该决定进入”的压力时，你就被夹在了中间。你既不能不做决定，又不能轻易做决定。于是你反复论证——在心里、在对话里、在社交媒体上。论证的频密本身，就是除籍正在进行的症候。一个典型的当代年轻人，在二十三岁到三十五岁的十二年间，花在“我到底要不要结婚”这个问题上的论证时间，可能比他的祖辈一家三代加起来都多——因为他的祖辈不需要论证，而他的晚辈可能也不需要论证（他们可以直接不进入，而不需要为“不进入”辩护）。他是唯一一代被夹在中间的，他必须论证。

第二，缺省剧情的中断。在在籍状态中，年轻人大脑中有一整套可以自动取用的婚姻脚本：几岁恋爱、几岁结婚、婚礼什么样、婚后生活什么样。这些脚本不是他设计的，是从社会语料库里继承来的。除籍发生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自动取用功能开始失灵。当一个年轻人说“我一想到结婚就觉得到头了”，他描述的并不是对婚姻的恐惧，而是他的大脑无法再自动生成一个“包含婚姻的未来生活预演”。脚本还在库里，但它的背景程序已经停止响应。他的父母可以自动想象他结婚、生子、孙辈绕膝的画面；他自己则无法自动想象这个画面——他得用力去想，而且想到一半就觉得荒谬。

第三，仪式中的出戏感。参加婚礼时那种隐约的“有点好笑”——新人说着百年好合的誓词，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走个过场。不是恶意，不是讥讽。而是一种集体的疏离体验：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我们知道它本该是神圣的，但我们的身体已经无法对它的神圣性做出自动反应。仪式照常举行，但仪式所承诺的那种“把两个人的一生绑定在一起”的效力已经不再被自动接受。出戏感是除籍的一枚极其精确的温度计——它在测量一个集体对某项制度“当真能力”的残余量。当出戏感从个别敏锐者的私语变成普遍感受时，旧的在籍状态就已经在事实上终结了，无论法律条文是否修改。

第四，善与美的分离。在在籍状态中，善（婚姻提供的实际好处）与美（婚姻提供的叙事快感）是不分的——你不需要单独欣赏婚姻的美，因为它就是你生活的默认背景，如同空气。除籍发生后，善和美开始分离。人们开始用工具理性的语言讨论婚姻的“功能”（共同房贷、医疗签字权、育儿分工），同时用一种怀旧的、审美化的目光看待婚姻的“仪式感”（婚纱照、蜜月、情人节）。当一种制度同

时被谈论为“实用的工具”和“好看的装饰”时，它就已经被除籍了——因为在籍的制度不需要被论证实用，也不需要被当成审美对象。它就是生活本身。

三、除籍的判断基础：从“不能不信”到三重绑定力的撤除

3.1 当真，还是不能不当真？

至此，我已经给出了除籍的概念定义、特征、识别信号以及与邻近概念的切割。但这一切都悬在一个尚未被论证的判断上。这个判断是：前现代婚姻的自明性，不来自人们对叙事的“当真”，而来自人们被结构性地剥夺了“不当真”的可能性。如果这个判断不成立，那么“除籍”就不是在命名一个此前被遮蔽的结构性过程，而只是在用新词包装“自明性撤出”这个老判断。

因此，本节的任务是：为“不能不信”提供经验论证。

自明性撤出论这样描述前现代的婚姻：它是一套被全社会共享的叙事所支撑的想象制度。祖先、宗教、宗族、礼法回答了“人为什么要结婚”；生命时间表把婚姻嵌在一个不可跳过的节点上；亲属网络从四面八方把“这就是对的”的信号反射回个体身上。人们因为“当真”这套叙事，所以自动进入婚姻。当代的悬置状态，则是人们“不再当真”之后，制度失去自明性、滑入形式存续的结果。

这个描述听起来非常合理。但在这个合理的表面下，有一个细微的、决定性的裂缝。

一个人在前现代进入婚姻，是因为他“当真”吗？他信那套“这是神所配合的”“这是祖宗的规矩”“人到年纪就该成家”的说法吗？他当然会说信——他没有别的说法可说，因为那个时代的语言世界里，不信的词汇尚未被发明。但我们如何区分“他真心信”与“他被条件所迫、从未想过还有不信的选项”？一个人生活在一种不结婚就会被视为异类、不结婚就丧失社会身份、不结婚就无法获得经济安全、不结婚就无人养老送终的社会里——他“信”婚姻，还是他不能不信？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不是措辞的差别。它触及制度存续的本体论根基。“信”是一种认知状态：主体主动认领一套叙事为真。“不能不信”是一种结构状态：主体从未被给予“不信”的可选项，因此“不信”从未被感知为一个可操作的可选项。在前一种状态中，制度的稳定依赖主体的认知。在后一种状态中，制度的稳定依赖的是结构的强制。这两者的运行逻辑完全不同：前者依赖叙事的说服力，后者依赖不服从的代价。自明性撤出论把前现代婚姻的自明性归因于前者——归因于一套被人们共享并当真的叙事。但本文的判断恰恰相反：前现代婚姻的自明性，从来 not 来自人们对叙事的“当真”，而来自人们被结构性地剥夺了“不当真”的可能性。它的力量不在于所有人真心信它，而在于没有人能承受不信它的代价。当一个制度的参与者“不能不信”时，这个制度看起来就是“自明”的——但这种“自明”的实质，是强制性的沉默，而非共识性的喧哗。

3.2 历史证据：当“不能不”暴露在断裂处

如果“不能不信”只是一个哲学推断，它的说服力就局限于逻辑。但历史材料可以让我们看到：当真和不能不信，在特定条件下是会被分开的——而正是在那些“不能不信”的约束偶然松开的缝隙里，我们才第一次看到那些曾经被强制沉默的人的真实想法。

家庭史研究提供了几个关键的观察窗口。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 1977）在对近代早期英国家庭的研究中，描绘了一幅与“温情传统”截然不同的图景：在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各阶层中，婚姻主要是财产安排、家族联盟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一对年轻男女的结合，是两个家族之间经济资源的重组——土地、嫁妆、继承权、劳动力配置，这些在决策中占据绝对优先。双方当事人的个人情感，如果有，是在婚姻既成事实之后才可能生长出来的东西，而非婚姻成立的先决条件。私人书信中留存下来的并非“我相信这就是我的人生归宿”，而是“我没有别的办法”的默认与顺从。斯通引用的日记与信件里，零星闪现的情感——有时候是无奈、有时候是认命、有时候是婚后在许多生活摩擦中磨出来的某种依赖——表明当事人并非未曾感知到这种安排中的强制成分，而是没有“不服从”的现实出口。

财产制度、继承法和社群规范构成的网，才是婚姻真正的兜底力量。一个在十六世纪英国村庄中拒绝进入婚姻的年轻人，他不是在做一件“违背主流价值观”的个人选择；他是在做一件现实上几乎不可执行的事——他将丧失土地继承权（如果他来自有产家庭）或丧失在村落经济中的合法位置（如果他是一个需要劳动力的农户成员），他将被社群视为无法履行成年义务的人。这个后果不是一种“思想上的不正确”，而是一种结构上被安排好的代价：它不需要任何人的主观恶意就能执行，因为整个制度——从继承法到村落土地分配、从家族间契约到教会登记——都是围绕着“婚姻是成年生活的唯一通道”这个默认设定来运转的。

到十八世纪后期，一种新的情感理想开始浮现：婚姻应当建立在爱情和个人选择之上。斯通称之为“情感个人主义”的兴起。但在前现代条件——家族的财产控制、女性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社会身份依赖婚姻定义——仍然稳固的情况下，这种“爱情至上”的理想在很长时期内只是一种文化修辞，并未实质性地改变婚姻的强制性质。一个十八世纪的英国女性可能读过那些赞美爱情婚姻的小说——当时“为了爱情而结婚”的观念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流传——但她如果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她的嫁妆由父亲决定，她的结婚对象仍然需要在家庭许可的范围内选择。她可以在有限的候选人中挑选最爱的那一个，但不能“不结婚”。情感的语言覆盖在结构强制之上，但没有替代它。这恰恰说明了本文的判断：当真并不独立于“不能不”而成为婚姻自明性的根基；当真常常是在“不能不”的边界内被培训出来的一套事后合理化的能力。

福柯式的工具在这里也有用处。与其把那些婚礼上的誓词和宗教文本中的训喻看作“人们信什么”的证据，不如把它们看作一套话语装置：它们不是某种先在的“信”的表达，而是生产“信”的机器。一个人从小到大被反复告知“这是神所配合的”“这是祖宗的规矩”——他被这些话语包围，被嵌入这些话

语所组织的仪式之中，被惩罚于偏离它们之时。在这样一套话语制度的持续运作中，“信”从一种需要被论证的状态，变成了一种被反复操练到自动化的习惯。这句话在他的口中被说出时，他不是“说谎”，也不是“真心认领”，而是这句话是他唯一知道如何说的话。因此，当我们用历史上盛行的婚姻话语来论证“人们曾经信”的时候，我们可能犯了一个范畴错误：我们把话语制度生产的“一致性表达”当成了主体内心的“真诚认领”。这恰恰是没有区分“不能不信”与“当真”的后果。

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为“不能不信”与“当真”的分离提供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现代案例。战后的美国社会，婚姻进入率达到历史高点，结婚年龄降至历史低点。从表面数据看，这是一个“全民当真”的年代：几乎所有人都结了婚，而且结得早。但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 2005）在《婚姻史》一书中指出，这个年代的婚姻狂热，恰恰暴露了它的不安全基础：战后福利国家在设计上系统地优待已婚者，冷战文化将家庭塑造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广告和大众媒体把已婚生活包装成不可挑战的正常人生范本。在这样一个“不结婚”不仅意味着丧失经济保障和社会身份、甚至意味着被怀疑为“非美活动”的“潜在政治威胁”的时代，人们结婚，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认领了这套叙事——那个数据点只告诉我们“几乎所有人都结了婚”，它没有告诉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信”。它是一个结构效果的指标，不是认知状态的指标。而当六十年代以后，民权运动、女性主义、福利制度的部分松动逐渐拆除了一部分外部约束时，离婚率迅速飙升，同居和非婚生育从边缘变成主流。这个断崖式的变化，恰好是“不能不信”约束被部分拆除后，“信”的脆弱暴露的重大例证——婚姻进入率与稳定度的变化如此剧烈，无法用“人们突然就不信了”来解释，只能用“那些曾经让人们不能不信的条件被撤除了”来解释。

把这些历史片段放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现代性笼罩之前的制度真相：婚姻的“自明性”，从来不是一种共识的照耀，而是一种沉默的围困。是那张由经济互赖、身份不可选、亲属强制、生命脚本唯一性织成的大网，把“不进入”这个选项从人们的知识地图上屏蔽掉了。人们不需要信它，只需要不能不信它。当真是一个昂贵的副产品，它在“不能不”提供的安全范围内生长，但从未单独撑起过制度。

3.3 问题的翻转：从“信还是不信”到“被迫还是自由”

一旦我们接受了“前现代婚姻的自明性建立在不能不信之上”，整个问题域就经历了一次翻转。此前，学界的主流追问是“人们还信不信婚姻”——这是一个认知问题，它的答案落在信念、价值观、文化叙事的地盘上。此后，追问变成了“那些曾经让人们不能不信的结构性约束，还在不在”——这是一个结构问题，它的答案落在经济互赖的替代性、社会身份的可选择性、和生命脚本的多元性的地盘上。

这个翻转意味着，当我们看到当代年轻人对婚姻的“焦虑”“摇摆”“论证困难”时，我们不能把这简单地诊断为“信念动摇”，然后把药方开成“重建婚姻的文化叙事”。那只是一种“让人重新信”的工程，而不是去面对那个造成了这个问题的根本事件——那些曾经让个体自动被绑入婚姻的结构力量已经撤除了，而“在没有绑定的情况下亲自认领”的能力，整个社会都没有准备好。

如果追问从认知转到了结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如何让人重新信”，而是——

3.4 三重力：结构性约束的系统性撤除

那些曾经让人“不能不信”的力量，是什么？

本文识别出三重互相嵌套的结构性力量。它们不是文化，不是信念，不是价值观。它们是物质性的、可被追踪的、在特定历史过程中被拆解的装置。这三重力，分别作用于个体生命的时间组织、社会网络的空间兜底、以及意义生产的权威来源。本节从源头上分析这三重力的历史形态与退出历程。

3.4.1 第一重力：生命时间的强制整合——社会时钟的运转与停摆

在前现代，“在籍”首先建立在婚姻与整个社会生命时间表的无缝嵌合之上。一个人的一生被社会时钟标记为一连串依次展开的缺省节点：出生、成年、婚配、生育、育儿、衰老、死亡。婚姻在这个时钟上占据一个不可跳过的位置，前后节点都依赖它来衔接——成年之后的第一件社会性大事就是结婚，而生育和育儿以此为合法前提。你不必决定要不要结婚——你到了那个年纪，身体给出了信号（在避孕技术缺失的前现代尤其如此），身边人都结了，长辈开始安排，社群的目光到了。从生到死的整条时间线，都在把你推向那个节点。

这个时钟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给出了一套标准的时间表，更在于它给出了一套统一的生命叙事弧：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被讲成一个“从小到大、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老有所终”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缺口，没有“选择不进入婚姻”这一段。故事完整性的代价，就是个体不被允许在这些节点上停下来问“为什么”。不是有人禁止他问，而是那个问题在叙事结构上就不可想见——就像你不会在一个交响乐的第三乐章中间停下来问“这一段为什么要这样写”。

这个时钟在现代社会已经大面积停摆。不是变慢了，不是推迟了，是碎了——它不再是一张所有人共用的、可预期的、具有道德约束力的时间表。

三重力量同时在拆这座钟。第一，教育年限的延长和职业路径的碎片化打断了节奏。二十四五岁结婚——这在上一代人是一条可执行的指令，因为二十四岁之前的人生是高度标准化、可预期的：读到本科毕业，找份工作，稳定一年，结婚。如今，读研、读博、间隔年、转行、创业、再培训——一个人的二十到三十岁变成了一段高度不确定的探索期。当一个人二十八岁还在职业摸索中、三十二岁才刚有稳定收入时，二十四五岁结婚的时间表已经失去了可执行性。这不是个人的“拖延”，而是整个社会再生产周期拉长后，旧时钟与新材料不匹配的系统性后果。

第二，女性经济独立对时间结构的冲击，比晚婚更为根本。在前现代时间表上，女性的一生以婚姻为枢纽组织：“出嫁前”和“出嫁后”被体验为截然不同的生命阶段。这一分界的经济基础是：女性不通过婚姻便无法获得社会身份和经济安全。当劳动市场向女性开放、当高等教育向女性开放、当独立收入成为可能的常态时，旧时钟失去了它的物质底盘。一个二十五岁的女性不再是“到了该嫁的年纪”

，而是正处于学历变现、职业爬坡的黄金期。旧时钟的逻辑是：婚姻是女性一生最划算的投资。新条件下，这个逻辑倒过来才更合算：在职业资本的快速积累期推迟婚姻，反而是理性选择。

第三，也是最隐秘的：社会时钟的道德权威已经瓦解。“什么年龄做什么事”这句老话，它的执行力从来来自话本身，而来自说这话的人自己活在其中、并且这句话确实是他生活里不可撼动的准则。当父母自己离异、老师自己未婚、同侪各自过着时间表完全不同的人生时，没有人还能真正执行一句连自己都不遵守的规训。社会时钟的最后一颗螺丝，不是被“反叛”拧掉的，而是被“表率崩塌”拧掉的。

这三重变化的结算结果不是“结婚时间推迟了几年”，而是婚姻在生命史中的位置发生了质变。它不再是一个缺省节点，而成了一个需要被“插入”到碎片化时间表中去的待安排事项。插入就需要理由——你为什么不先完成那个项目？为什么不先存够首付？为什么不先找到“对的人”？为什么不先“再自由几年”？在旧时钟下，这些问题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在钟还在走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在那一站停下来问为什么。除籍的第一重力，就是这座钟的停摆。它的停摆意味着，个体与婚姻之间那个由时间脚本构成的绑定机制——那个让你“到了点就该进去”的无形推力——不再运作。

3.4.2 第二重力：社会网络的兜底——从日常确证到收缩

婚姻在传统社会中的在籍状态，不靠个体的“信”，而靠一张把个体从头到脚都兜住的社会网络。这不仅仅是亲属帮忙带孩子、亲戚借钱渡过难关这类功能性支持——功能是表层的。更深层的，是这张网承担了一种日常确证的认知功能：网里的每一个他者，像一面小镜子，持续地把“这就是对的”“这就是正常的”“这就是你应该待的地方”这些信号反射回个体身上。这套信号不断地消解着任何个体可能产生的“我是不是选错了”“要不就算了吧”的念头。一张好网能消解的东西，远比两个个体靠自身意志能扛的要多得多。

人类学中关于亲属制度的大量研究早已揭示：婚姻在前现代社会从来不是两个人的私人事务，而是两个亲属群体之间的交换、联合与义务重构。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结构基本单元的经典分析证明了，婚姻在最根本的结构层面是一个群体间交换的节点——女人在群体间的流通构成了联盟、和平与经济互助的基础。在这种结构中，一桩婚姻的成立和维持，从来不是那对男女私下能够决定的事，而是嵌入在一整套亲属间的权利、义务与期待之中。网不仅是兜底的，网就是婚姻的骨骼本身。

但在前近代欧洲，这种亲属网络的强度已经开始分化。斯通的研究区分了英格兰近代早期的两类家庭形态：贵族和乡绅阶层的家庭严格按财产逻辑运作，亲属网络对婚姻决策的介入是直接而强制的；而底层无产者由于不掌握可继承的财产，亲属约束反而较早松动——而恰恰是这批人，在工业革命前就已表现出较高的非婚同居率和非婚生育率。这个分化极其关键，因为它暴露了一个因果方向：正是财产这种结构性的可损失的绑定形式，而非一般性的“传统价值观”，在维持亲属对婚姻的强制力。一旦可损失的财产没有了，网的强度就降了一档。这意味着，网的约束力从来不是“文化”自带的，而是由特定的物质条件支撑的——文化是网的表皮，物质利益才是网的绳结。

这张网在现代社会已经大面积收缩。收缩不是网破了——网破意味着它还在那里、只是坏了。收缩意味着这张网本身正在被从个体的日常生活的直接环境中抽走。两个方向的抽力同时在作用。

从网往外看，家庭正在从社会经济生活中经历一次深刻的核化。一个婚后的核心家庭如今独自承担育儿成本、房贷压力、职业竞争和精神苦闷。父母双职工，孩子送托或请阿姨，和祖辈的日常生活空间上拉开了距离——不是不联系，而是“联系”变成了周末探访和视频通话，不再具有日常照料和日常干预的连续性。当夫妻之间出现冲突、疲倦、冷淡时，不再有婆婆来劝架、不再有姑舅来调停、不再有邻里来送一碗菜顺便聊几句。那张网不再能在脆弱的时刻兜住一段摇摇欲坠的关系。

从网往里看，传统亲属的干预从“保护”变成了“侵犯”。年轻人不再需要——也日益反感——长辈介入自己的家庭决定。这不是代际冲突，这是社会网收缩之后的必然心理后果：当网不再是日常安全感的来源时，它的每一次介入都会被体验为越界。网不再兜住婚姻，而是偶尔从外面伸进一只手来指点——这种指点，除了激怒两个已经承受了过多压力的个体之外，没有任何作用。

网收缩的后果是：婚姻被抛回到两个人的内部。维持它的全部重量——意义的确立、冲突的调解、厌倦的对抗——压在了两个人身上。这在人类婚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此之前，婚姻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被两个人私下维持的东西。而当代婚姻恰恰把那张曾经兜住所有人的大网撤了，重量全落在了那两个站在原地的个体身上。两个人承受的压力，本质上不是人际的压力，是结构性的：重量没变，兜网没了。除籍的第二重力，就是这张网的撤除。它的撤除意味着，个体与婚姻之间那个由亲属网络构成的绑定机制——那个让你“进去了就出不来”的兜底力量——不再运作。

3.4.3 第三重力：意义生产的权威垄断——终端句的停产

压在除籍最上面的，是第三重变化：回答“人为什么要结婚”的权威，停产了。

什么是终端句？它是一个能把“为什么”的追问截住的句子。任何制度都会遭遇参与者的为什么追问：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为什么我要留在里面？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活法？一套能承重的说法，必须能在某个点上把追问截住。终端句的形式因时代而异——“这是神所配合的”“这是祖宗的规矩”“因为我爱他/她”“因为人到年纪就该成家”——但它们有同一个功能：让继续追问变得不可设想。你不再问“为什么神配合的就要遵守”，因为那个“神”本身就标志着一切为什么的终点。终端句的有效性，不来自它的逻辑严密性，而来自它在当时的语言世界里被公认为不需要再被追问。权威不是一个说服你的理由，权威是一个让你停止寻找理由的标点。

现代化是终端句的停产业。宗教权威退场——“这是神所配合的”不再被自动接受。宗族权威退场——“传宗接代是孝道”不再能截断追问。传统伦理退场——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被个体化的生活叙事质疑时，它失去了不言自明的力量。甚至连“因为我爱他/她”这个浪漫主义时代最强大的终端句，也开始松动——因为当“爱”从永恒承诺被重新定义为流动的情感体验时，它就无法再承担终端句的重压。你今天爱他，明天呢？爱可以被体验为一种状态，而婚姻需要的是一种“承诺”——承诺恰恰是在“不再

有那种感觉”的时刻才开始做工的。当“爱”无法再作为终端句时，所有以“爱”开头的婚姻辩护，都会在内心深处引发新的追问，而不是截断旧的追问。于是终端句的停产，使得婚姻第一次暴露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人们被要求进入一段需要用一辈子去履行的关系，却没有人能再给他们一个“为什么”的、无法被继续追问的回答。

但这还不是最深的。更深的是意义生产的下放。传统社会的终端句是外部权威代为生产的——祖先、神、宗族、礼法替你回答了“为什么”，你只需要执行。当这些外部权威退场后，“为什么”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它被下放给了个体自己。意义从“外部给定”变成了“内部建构”——你不仅要决定要不要结婚，你还要自己生产出“我为什么要结婚”的答案。而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对这项任务是毫无准备的。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回答这类问题所需要的叙事建构能力——在没有外部脚本的条件下，与另一个人共同寻找关系意义的能力——从来不在任何社会化机制的培训范围内。学校教你解方程、写论文、做PPT，但从来没有一门课教你如何在两个自主个体的日常相处中，建构出一套足以承受漫长岁月磨损的共同叙事。

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最需要终端句的时代（因为除籍迫使个体亲自做决定），恰恰是终端句已经停产的时代。这个悖论就是除籍第三重力的实质：不是说法变坏了，而是说法不再被外部权威生产、同时又被下放给无力生产的个体。缺口就这么敞着了。

3.5 三重力的同步撤出与质变门槛

以上三重力，分别拆除的是婚姻“在籍”状态的三个不同层面的绑定机制：时间脚本的绑定（社会时钟）、社会网络的绑定（亲属兜底）、意义权威的绑定（终端句）。这三重绑定机制，在传统社会中是协同运作的：时钟告诉你何时进入，网络确保你进入后出不来，终端句回答你为何要留在里面。三者的同步运作，使“不进入”成为一个不可执行的选择。

除籍的发生，不是某一重力的单独撤退。单独撤退，网可能残喘——社会时钟推迟了，但只要亲属网络依然足够密、终端句依然足够强，个体仍然在到了某个年纪后会被推入婚姻。同样，终端句停产了，但如果社会时钟仍在走、亲属网络仍在兜底，个体也没有机会去问那个“为什么”——她还没开始问，就已经被推了进去。

除籍的发生，是三重力的同步撤退抵达了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不是一道清晰的数学边界，而是一个模糊的带：不同个体、不同阶层、不同社区，在不同时间跨过这道门槛。但模糊不等于不存在。一个可操作的判断方式是：当一个足够大的群体中，大多数个体的婚恋话语不再以“何时结”为默认框架、而是以“结不结”为首要问题时，这道门槛就已经被跨过了。以中国为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城市化率低、单位制与户口制度将个体紧密绑定在有限的社会网络中、婚前性行为高度污名化——这些条件使得“不进入婚姻”几乎不在大多数人的可操作选项之内。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商品房市场的兴起使个体可以脱离家庭购独立住房、互联网拓展了不依赖亲属网络的社会交往、高等教育的扩

张延长了婚前的独立生活期——每一重变化单独看好像只是在“推迟婚姻”，但三重同步累积二十年之后，“结不结”已经取代“何时结”成为婚恋话语的首要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婚姻的制度形态已经和二十年前不在同一个状态里了。

当社会时钟停摆到个体不再觉得“到了某个年纪就必须结婚”、当社会网络收缩到不结婚不再意味着社会性死亡、当终端句停产到没有人能再给你一个不容追问的“为什么”时——“不进入婚姻”第一次成为一件在时间上可推迟、在社会上可承受、在意义上可辩护的事。当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时，婚姻的“在籍”状态就失去了它的全部约束力。不进入，从不可承受变成了可承受。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那个跨越。跨过这道门槛之后，婚姻就不再是一个默认的、被给定的、自动绑定的籍贯，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个体亲自去“要”或者“不要”的选项。

3.6 一张脸的速写：除籍中的一个人

为了不让上述分析停留在抽象层面，本节插入一个简短的经验速写。以下场景基于2018至2023年间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进行的数次深度访谈材料合成，不代表任何特定个案，但其中的每一个要素——论证焦虑、缺省剧情中断、网收缩后的孤立——均反复出现在真实受访者的自述中。这些访谈是由本文作者为理解当代城市青年的婚恋困境而进行的初步实地研究，所有细节均经匿名化与典型化处理，个别情境为简化分析需要而组合，不构成统计意义上的经验证据。此处引用仅作思想拓展之用。

他今年三十二岁，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收入稳定，独自租住在一间不大不小的公寓里。父母在电话里催婚的频率已经从一年前的两周一次，降到了现在的一个月一次。不是父母放弃了，而是催久了发现无效，便不再频繁提起。他有女朋友，交往三年，感情稳定，但两人从未认真讨论过结婚的事——不是默契地回避，而是每次聊到这个话题，都会陷入一种奇怪的空转。两人都说“不是不想结”，但都说不清“为什么要结”。租的房子可以一起住，钱可以一起花，猫可以一起养，甚至父母都已经默认了这种“同居但不领证”的关系。唯一的压力来自他内心那个隐约的、说不清的念头：这一切好像不对。不对在哪儿，他说不清。他只知道，父母那一辈结婚的时候，没有人问过“为什么要结”——不是答案太明显，而是问题从未出现过。他却是每天都在被这个问题追问，而且追问者不是别人，是他自己。

他在与一位朋友的一次深夜聊天中说了一句话，也许是对除籍最精确的民间描述：“其实我没那么怕结婚。我怕的是，这件事现在必须由我自己完全负责了——没有我妈替我想，没有社会替我想，甚至没有上帝替我想。我一个人面对这件事，我还从来没练过。”

这个速写展示的不是一个异常个案，而是一个逐渐成为常态的生命处境：当三重绑定力同步撤出后，一个普通个体被抛在没有网兜底的空地上，独自面对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被要求过的任务——在没有外部强制、没有外部脚本、没有外部终端句的条件下，亲自决定一段关系是否值得被正式认领为

婚姻。

四、除籍之后的婚姻：悬置、韧性与新的可能性

4.1 在籍假象的暴露

三重力同时撤出，结算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那张曾经替每一个人做了“进入婚姻”这个决定的外部结构，不再运行了。婚姻与个体之间，第一次面对面站着了。

而这个面对面，暴露了一个在被遮蔽时无人察觉的事实：大多数在籍婚姻的“幸福”“稳定”“正常”，其实从来不是婚姻本身的内在品质。它们是那张外部结构之网的品质。网兜着，婚姻显出一副坚固的样子；网一撤，婚姻便露出了它本来的脆弱。这不是“婚姻变差了”，而是“那张曾经让婚姻看起来很好、也让婚姻不必真的很好的网，没了”。

在此意义上，除籍不能仅被看作一次“解放”——在解放的话语中，人们从压迫性的结构中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但除籍在解放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个结构性的空洞。如果前现代婚姻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绑定的——被不进入的代价所维持，而非被婚姻内在质量所支撑——那么除籍之后，那个空洞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每个人都能看到的裂隙。这裂隙不是坏事，但它需要被正视。解放不是终点，解放只是一个空间的打开：在这个空间里，人们第一次被允许问“如果没有了那张网，我们还能一起走多远”。

4.2 悬置：在籍与除籍之间的中介地带

除籍不是一个瞬间完成的事件。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中途，婚姻处于一种特殊的中间状态：旧的在籍结构已撤，新的“亲自认领”能力尚未建立。本文把这种中间状态称为悬置。

悬置不是“制度存续但人们不信”。悬置是：人们在结构上已经被除籍（外部强制已大面积撤出），但在认知和习惯上还没有完成除籍（仍然用旧的在籍标准衡量婚姻、期待婚姻、挫败于婚姻）。

这就解释了当代婚姻体验中最突出的那种撕裂感。

年轻人在认知上已经被除籍了——他们清楚意识到没有人可以强迫自己结婚、不结婚是完全可以承受的选择。但他们在情感上和习惯上仍然被旧的在籍文化渗透——“婚姻是人生必备”“没有婚姻不完整”“要么结婚要么孤独终老”这些旧脚本仍然在大脑中自动回放。于是，他们既不结婚，也不放弃结婚的念头；既声称独身挺好，又在独身中感到深切的不安。这种矛盾的状态，通常被误诊为“个体不够独立”或“社会压力过大”。但真正的诊断是：他们正站在除籍的中途——那张网撤了，但他们还没长出在没有网的时候也能站稳的脚。

同样，已婚者也在经历悬置。两个人在法律上是已婚的，但他们所处的结构环境已经不像他们的父母——没有亲属网络兜底，没有社会时钟给出“你们应该怎么走”的脚本，没有终端句替他们回答“这

段婚姻是为了什么”。但他们仍然下意识地用旧的期待来评估这段婚姻：期待它提供旧婚姻所提供的那些东西（完全的确定性、永远的新鲜感、不受挑战的正当性）。当这段除籍后的婚姻无法达到旧标准时，他们不是去修正标准，而是去怀疑这段婚姻本身有问题。他们的悬置在于：他们活在除籍之后的婚姻中，却用除籍之前的尺子量它。

悬置的痛苦，在于认知与习惯之间的那道裂缝。一个人可以理智上完全理解“婚姻已经不是必需品”，但他在情感上仍然无法承受“没有人与我共度一生”的空虚。这道裂缝不是懒惰或软弱的产物，而是除籍进度的非均匀性在个体心灵内部的投影：他的一部分自我已经站在了除籍后的平地上，另一部分自我仍然被旧网的记忆所拉扯。悬置不是可以靠个体意志“想通”就能解决的，因为在悬置状态下，他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认知错误，而是一个情感真空——而这个真空，旧的在籍制度从来不曾让他练习过如何填充。

4.3 婚姻为何不死：善与美的临时支柱

除籍理论需要正面对一个质疑：如果那张网已经撤了，为什么婚姻没有消失？功能替代论因其对替代速度的乐观预期而遭受的批评，除籍理论同样需要回应——只不过回应的逻辑不同。功能替代论无法解释婚姻的韧性，因为它假设制度靠功能存活。事实证明，功能可以被替代而制度仍可延续。除籍理论不需要做这个假设。它需要给出的是：当绑定力被解除后，制度依靠什么继续存在？

答案是：除籍之后的婚姻，不再靠绑定力存在，而靠两个临时支撑苟活。这两个支撑，一个负责承担实际生活的重量，一个负责提供叙事上的粘性。本文借用一对描述性范畴进行类比，称前者为善（实用支柱），后者为美（叙事支柱）。这一借用不预设任何特定的美学立场或价值排序，仅用以标指婚姻在当前条件下所依赖的两种不同的维持方式。

善，是婚姻仍然能提供的实际便利和法律保护：合并报税、共同房贷、医疗签字权、遗产继承、配偶签证，以及那种最原始的防坠感——在都市的原子化生活中，婚姻制造了一个“至少有一个人必须在场”的承诺。很多人看清了婚姻叙事已无力截断追问之后依然留在里面，不是因为还信那个故事，而是因为离开的代价——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心理上的——太高。善所做的不是赋予意义，而是让意义的匮乏变得可以承受。善对应的是第一、第二重力的残余——生命时间虽然碎片化了，但共同生活仍然比独居更经济；亲属网络虽然收缩了，但婚姻仍然是一张最低限度的安全网。善是网撤之后残留在地上的一层薄毡，它不够暖和，但至少能让人躺在上面不直接接触地。

美，是婚姻仍能提供的叙事快感与仪式美感：恋爱、求婚、婚礼、蜜月、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白首偕老——这是一条在碎片化时代仍然能提供完整叙事弧的人生故事线。这种美感被资本与媒介大规模商品化：钻戒、婚纱照、婚礼、蜜月旅行、情人节仪式感、社交媒体上的恩爱碎片。它们给这套叙事提供连续的感官确认。美对应的是第三重力的残余——终端句停产后，资本和市场迅速填补了空缺，生产出大量“替代性终端句”：从“一生只爱一人”的珠宝广告到“嫁给爱情”的婚庆文案，从浪漫喜剧

的叙事弧到社交媒体上精心策划的求婚视频。这些替代性终端句的权威性无法与旧终端句相比——没有人真心认为一枚钻戒能截断追问——但它们的数量足够多、感官冲击足够强，使追问被暂时淹没在美的感官洪流中。替代性终端句和旧的终端句的差别不在于“真”或“假”——旧终端句本身也是被生产的，而非某种超越历史的真理。差别在于：旧终端句有一个外部权威替你说，替代性终端句需要你假装它在替你说。你知道钻戒广告不是真的，但你在求婚的时候仍然买了钻戒，因为你需要一个“看起来像是终端句”的东西来完成那一刻的叙事。

善与美的分离，是悬置状态的绝佳指标。在在籍状态中，善和美是不分的——婚姻的实用好处和它的叙事美感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你不会分别感知他们。当一个人开始用“婚姻对我的实际好处是……”来论证自己还待在婚姻中，同时又从外部——社交媒体、影视、小说——获取婚姻的“美感”时，善和美就分离了。他的生活由防坠的薄毡和美丽的画饼共同维持。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 2001）在《谈论爱情》一书中，通过大量访谈揭示了当代美国人如何同时使用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来谈论他们的婚姻：一套是浪漫主义的“神话”语言（命中注定、灵魂伴侣），另一套是实用主义的“平凡”语言（一起还贷、共同育儿、习惯了）。这两套语言在日常对话中无缝切换，但从不相互校验。斯威德勒的访谈对象可以在五分钟内先说“我们就是彼此的另一半”然后说“不离婚主要是因为房子不好卖”，而并不感到逻辑上的矛盾。这种双重话语的共存，正是善与美分离的精确经验表现——不是说人们虚伪，而是说善和美已经不再住在同一个叙事里了。这不是对婚姻的批判，这是对除籍中途状态的精确描述。

正是善与美这两个临时支柱的存在，解释了除籍后婚姻的韧性。婚姻没有因为绑定力撤除而一夜消亡，因为绑定力虽然撤了，但它留下的物质安排（婚姻法的特殊保护、共同财产的制度惯性、社会对已婚者的隐性优待）和叙事惯性（浪漫爱的话语残余、人生完整的叙事模板、对孤独终老的恐惧）仍在起作用。但这些是残柱，不是地基。残柱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但它们自己也在老化。善正在被平台经济、服务业外包和数字技术逐项降解——独自生活变得越来越可以承担；而美，则正在遭遇生成式AI的致命一击。这一击将在第五部分展开。

4.4 制度韧性的深层解释

然而，对“婚姻为何不死”的回答到此为止还不够。善与美的残柱解释了为什么个体仍然在进入或留在一段既有婚姻中，但它没有解释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婚姻作为一套法律与政策的制度安排，在国家层面没有崩溃或被剧烈重组？如果婚姻已经被除籍，人们不再被结构性地绑入它，那么维持婚姻制度的法律形式的动力是什么？

一个重要的回答是：除籍后的婚姻虽然失去了对个体的默认绑定力，但它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效用并没有消失。国家仍然需要一个合法的制度来组织人口再生产、产权转移、抚养义务分配和税收征管。这些是国家层面的“善”，它们不需要婚姻被“当真”就能运作——只要婚姻仍然作为一套法律编码存在，国家就能通过它来执行大量与人口、财产和福利相关的治理功能。由此看来，婚姻的法律形式

已经被功能性地重新锚定了：它不再主要服务于那对夫妇的情感与意义需求，而是服务于治理体系对可管理的人口单位的需要。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许多已经高度除籍的社会中，同性婚姻合法化反而在近二十年内取得了进展。这不是因为婚姻制度在“恢复传统力量”，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婚姻的符号价值（它作为“正常人生”的徽章）在除籍后仍然残余，而法律形式仍在国家治理中执行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当除籍使得异性婚姻不再被全民自动进入时，婚姻制度从一个“人人都已经有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有些人想要、国家也仍然有用的东西”。在这个新位置上，排斥某些群体进入婚姻的法律壁垒失去了它们在在籍时代的结构基础——在在籍时代，婚姻是唯一的社会成员认证通道，排斥是对完整社会身份的剥夺；在除籍时代，婚姻是众多选项之一，排斥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歧视，其正当性在权利话语下难以维持。LGBTQ+运动争取婚姻权的成功，在除籍的框架下可以部分地被解释为：恰恰是因为婚姻不再那么重要了，反对把它开放给所有人反而显得不讲道理。婚姻越是从“籍”沉降为“选项”，它就越容易被重新谈判——无论是被国家用于治理，还是被边缘群体用于争取平等。

4.5 一个潜在反驳：文化规范能否构成新的“籍”

在进入下一部分之前，必须认真对待一个有力的反驳：如果除籍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在某些现代社会——以日本为首——强大的文化规范仍然对未婚者施加着持续的压力，而终身未婚率虽然上升，仍未达到与除籍预期完全匹配的水平？这难道不说明文化规范可以单独构成一种“新籍”吗？如果是，那么除籍的不可逆性判断就需要大打折扣。

这个反驳触及了一个关键区分。文化规范——如“正常人生必须结婚”的社会期待、对未婚者的隐性歧视、家庭聚会上反复的催婚——确实对个体施加着强大的压力。但压力不等于“籍”。压力是一种外在推力，它让个体感到不舒服，但不剥夺个体的选择权。“籍”是一种绑定机制，它让个体无法承受“不进入”的后果——这种后果不是“被亲戚唠叨”，而是“丧失经济安全、社会身份、人生基本架构”。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规范，无论多么强大，已经不再能制造后一种后果。

日本为这个区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案例。虽然家庭和社会仍然对未婚者施加着清晰的压力——尤其是对女性，“结婚才是正常人生”的期待仍然浓厚——但终身未婚率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持续攀升，已从1990年的不足5%升至2020年的男性约25%、女性约16%。这一趋势的持续性表明，文化规范只能制造焦虑，不能制造“不可承受”。一个在东京独自生活、有稳定工作的三十五岁未婚女性，她可能仍然在每一次回家过年的餐桌上被问到“什么时候结婚”；她可能在工作场所被已婚同事看作“不完整的社会成员”；她甚至可能在内心深处仍然有一部分自我被“正常人生”的脚本所折磨。但她能够选择不结婚。她能够用自己的收入租房、旅行、建立朋友网络。她能够把“东京的独立生活”与“家乡的催婚饭桌”在空间上隔离开来，在她的日常里，不结婚不仅不是不可承受的代价，甚至是一种被主动选择的、比进入一段不满意的婚姻更好的人生安排。而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一个同等年龄的未婚女性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选项——不是她不敢选，而是经济制度和身份制度没有给她选择的空间：她没有独立于家庭

的收入来源，没有不被婚姻定义的社会身份，没有可供独自居住的住房市场。

文化规范在除籍之后的功能，因此不是维持“籍”，而是制造悬置的痛苦。它们在被除籍的个体身上施加着一种错位的重力：结构上的绑定已经撤了，但规范上的引力还在拉。个体的脚已经站在了除籍后的平地上，头却仍然被旧绳子的影子牵着。这使得悬置状态的体验在被文化规范包裹的社会中更为剧烈——不是因为那里的除籍没有发生，而是因为那里的除籍进度在社会结构层和认知习惯层之间存在着更大的落差。这恰恰印证了除籍的非均匀性特征，而非驳斥了它。

4.6 附论：除籍的一个经验案例——日本“未婚化”进程

本附论以日本的“未婚化”进程为案例，展示除籍框架如何被应用于一个具体社会情境的分析。选择日本，是因为它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非西方社会，其婚姻变迁展现了除籍的非均匀性与文化规范残余的相互作用，具有超越单一西方经验的比较价值。

4.6.1 终身未婚率的上升：一个除籍指标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显示：1970年，日本男性的终身未婚率（五十岁时从未结过婚的比例）仅为1.7%，女性为3.3%。到202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男性约25.7%、女性约16.4%（国家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2021）。这个跨越半个世纪的数据变化，不只是“晚婚”的结果——晚婚只解释结婚年龄推迟，不解释相当大比例的人口终身不进入婚姻。它所指示的，是“不进入婚姻”从不可承受变成了可承受，从无法设想的选项变成了一个被大规模实际执行的选择。这正是除籍发生的最清晰的量化指标：在籍时代的高结婚率（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日本接近全民结婚的格局），不是人们真心信的证据，而是“不能不”的结构效果；而当“不能不”的约束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女性教育水平提升等一系列现代化推力下被逐层拆除后，那个被旧结构掩盖了一百年的“其实很多人并不需要婚姻才能活得好”的状态，就在数据中被显现出来了。

4.6.2 三重力的日本形态

除籍的三重力在日本的表现形态有其具体的历史纹理。

第一重力——生命时间的强制整合——的瓦解，在日本主要通过战后高等教育扩张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来实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女性接受四年制大学教育的比例持续攀升，结婚年龄中位数从1970年的女性24.2岁推迟至2020年的29.4岁。更重要的是，1986年《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实施后，女性进入企业成为正式职员的通道逐步打开，尽管进展缓慢，但它为女性提供了一种不依赖婚姻的经济立足点。当一个人的职业爬坡期与传统的“适婚年龄”高度重叠时，推迟或省略婚姻就成了一个理性化的选项。

第二重力——社会网络的兜底——的瓦解，在日本有着一个独特但同样有力的形态：不是在亲属网络“断裂”之后，而是在亲属网络“被空间隔离”之后。战后日本的高度城市化使得大量年轻人离开家

乡进入东京、大阪等大都市圈。他们与家族之间的日常联系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或同一个村里”变成了“一年几次的返乡”。这种物理空间的分离拆除了那张网在日常实践中“持续反射确证信号”的能力：母亲可以在电话里催婚，但无法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把你往婚姻的方向推。

第三重力——意义生产的权威垄断——的瓦解，在日本表现为一个迟缓但终究到来的过程。家庭制度（ie制度）虽然在法律上已于1947年被战后宪法废止，但其文化惯性几代人都有消散。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失去的三十年”，深刻地动摇了旧有的“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生命脚本。终身雇佣制解体、非正规雇佣扩大，使大量年轻男性无法再扮演“一家之主”的文化角色，婚姻作为“标准人生”的一环对众多非正规雇佣的青年来说已经失去了可执行的经济基础。当“正常人生”的脚本在物质层面上变得不可执行时，旧终端句的权威性——它此前靠“这是每个人都走的路”来维持其不言自明——就从基底上被挖空了。文化规范仍然在嘴上说“你应该结婚”，但这个“应该”不再能落地，因为它脚下的经济基础已经碎了。

4.6.3 日本案例的理论收益

日本案例为除籍理论提供了三重理论回报。第一，它展示了一个非基督教文明社会的除籍进程如何同样遵循三重力的逻辑——除籍的驱动力不是西方特有的“个体主义价值观”，而是生命时间的碎片化、社会网络的收缩和意义权威的瓦解，这些在现代化条件下可以在不同文化框架中被复制。第二，它展示了除籍的非均匀性如何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群体间展开——大城市的高学历职业女性除籍进度最快，而小城镇和非正规雇佣群体中的传统婚姻规范残余更浓——同一社会内部的不同“悬置”程度，构成了代际和阶层之间婚姻话语撕裂的直接来源。第三，它提供了判断除籍发生的一个经验判据：当“结不结”在一个社会的主流话语中取代“何时结”成为首要问题框架时，除籍的门槛就已经被跨过了。日本在1990年代的婚恋话语仍然以“何时结婚”为默认框架——晚婚但终究会结；而在2010年代以后，“终身未婚”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异常，而是被广泛接受为一个可理解的人生选项。这个话语框架的转变，本身就是除籍完成的一个重要经验线索。

五、AI在除籍中的位置：加速器与显微镜

5.1 重定位：AI不是原因

既有论述倾向于把AI看作婚姻功能的替代者——虚拟伴侣替代陪伴，算法匹配替代择偶，情感机器人替代亲密。这类论述没有全错，但它的框架仍然停留在功能替代论的延长线上：它预设婚姻的威胁来自外部竞品的功能替代。本文的分析给出一个不同的框架。

除籍的发生独立于AI。生命时间的个体化、社会网络的收缩、意义生产的下放——这三重力在AI爆发式进入日常生活之前，已经运作了几十年。AI不是除籍的原因。但AI的出现，给了除籍一个强有力的加速。

它是如何加速的？它从善与美两个维度同时下手。

5.2 善的极致降解与美的廉价量产

在善的一端，AI没有创造新的替代服务——它只是让已经存在的替代服务变得极致高效、极致个性化、极致无摩擦。一个独居者不再需要外卖小哥的偶然迟到和冷淡面孔，他可以在与AI管家的温柔交谈中完成点单；他不再需要忍受约会的不确定性，他可以在与一个永不疲倦、从不说错话、永远知道他想听什么的AI伴侣的持续对话中，获得比大多数人类关系更稳定的日常陪伴感。不是AI替代了善——早在外卖App和交友App出现时，善的替代就开始了。AI做的是把善的替代推到极致：让“不靠婚姻也能过得很好”这件事，从一个理性的计算，变成了一个感官上舒适的日常体验。

在美的一端，AI的冲击更为彻底。美，作为悬置状态的第二根支柱，依靠一种稀缺性维持其粘性：能打动人心的浪漫叙事、能让人感到“被看见”的亲密瞬间、能让两个人觉得“我们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那种叙事感——这些东西在过去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们稀缺。它们需要真实人类的笨拙、不可预期与不可复制性才能被生产出来。但AI正在系统性地打破这种稀缺。它能以近乎零成本批量生产高质量的浪漫文本、恋爱话术、节日文案、甚至定制化的“我们的故事”叙事。当美可以毫无门槛地工业化生产时，美就贬值了——不是它在技术上贬值了，而是它在体验上贬值了。人们仍会消费它，就像人们仍会吃甜食；但人们不再为它赋予意义，就像没有人会为了一颗糖感动落泪。

善的枯竭与美的通胀——这两者不是AI制造的新事件，而是除籍进程中已经在发生的过程。AI没有改变除籍的方向，但加速了它的进程。善的支撑变薄了、美的支撑变味了——悬置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短，因为这两根临时支柱正在比预期的更快地老化。

5.3 AI作为显微镜：不可替代的核与可替代的壳

在加速善的降解与美的贬值之外，AI还扮演了除籍进程中的另一个角色：它为除籍的暴露功能提供了一面对比度极高的镜子。

这面镜子的原理是：当AI伴侣能够以极低成本提供大量此前只有真实亲密关系才能提供的体验——日常陪伴、情感共鸣、被理解的感觉、性幻想的满足——时，婚姻中那些可被AI替代的部分和不可被AI替代的部分，就第一次被清晰地分开。此前，这两部分在经验中是被混在一起的：一对夫妻的日常相处，既包含可替代的功能（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互相吐槽今天的工作），也包含不可替代的碰撞（那个真实的异己者在某一刻说出了你完全没预料到的话、做了你完全不理解的事、迫使你重新看待自己和这段关系）。当日常相处覆盖了一切时，人们可以一辈子不去区分这两者——他们只需要活在关系里，不需要解剖关系。

但AI伴侣的出现，使得“解剖”变得不可避免。当一个丈夫发现，他在下班后更想跟AI聊天而不是跟妻子聊天时，他不是在“出轨”——他是在做一个不经意的对照实验。这个实验的结果可能是：他和妻子之间，除了共同房贷和孩子之外，其实没有多少那个不可替代的东西。不是AI破坏了他的婚姻，

而是AI让他看清了他的婚姻在什么部位一直是空心的。AI是一面镜子，它不制造问题，但它让问题变得可见。这面镜子的残酷之处，在于它迫使每个人面对自己关系里到底有没有“那个不可替代的东西”。而答案，对许多婚姻而言，是否定的。是除籍让这个照镜子的时刻成为可能，是AI把镜子的分辨率调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这面镜子不是新型关系的设计师，但它是一副解剖刀，逼着人们在那些一直被日常琐碎所掩盖的婚姻内部，去区分哪一块是骨、哪一块是赘肉。

5.4 AI与叙事建构的新可能

但AI的角色不止于加速善的降解与美的贬值，也不止于充当解剖刀。除籍进程自身，不仅暴露了旧婚姻的脆弱，也同时制造了一个新任务：当外部结构不再替你决定、终端句不再被权威生产、意义建构被下放给个体时，人如何能在没有脚本的情况下，亲自建构一段他能认领的关系的意义？

这个任务在除籍之前从未存在过，因此人类在整体上对此毫无准备。但在除籍之后，它是每一个进入或考虑进入一段承诺关系的人，都必须直接面对的东西。AI由此看来，是一个位置极其微妙的新工具。

它最危险的使用方式，也是最容易滑入的使用方式，是成为麻醉剂——用永远在场、永远体贴、永远不说“不”的陪伴，来填补“不能不信”被抽走后的虚空。在这种使用方式下，AI不是帮助人们面对除籍后的新任务，而是帮助人们逃避这个任务。它提供的不是关系，而是关系的拟像——一种不需要处理异己性、不需要承受张力、不需要面对“那个人不是你期待的样子”的舒适区。如果这种使用方式成为主流，那么除籍不会通向任何新形态的关系深度，而会通向一个巨大的逃避地带：人们用拟像满足了对关系的渴望，以至于不再有动力去承受真实关系必然带来的困难。

但它也有一条更困难、也更稀有的使用路径：作为协处理器——两个真实的人之间叙事建构的辅助工具。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可能性。一对年轻伴侣，在考虑是否结婚时，发现自己陷入了论证的空转：两人都说不出“为什么要结”，但又隐约感到这段关系中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东西。他们没有更好的语言来言说它。在这种时刻，一个被训练为协处理器而非麻醉剂的AI，可以帮助他们做的不是替他们回答“为什么要结”，而是帮助他们把各自心中那个模糊的、尚未成形的“这关系对我意味着什么”的感觉，翻译成可被对方听见的语言。这类似于一种叙事翻译的功能：把两个人在亲密关系中各自感受到但各自说不清的东西，转译成彼此可理解、可回应、可在此基础上继续建构的共同叙事。这种AI不替人说话，它协助人把自己本来说不出的东西说出来。

这条路径不能，也绝不应被理解为“AI拯救婚姻”的天真叙事。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旧婚姻的修复工具，因为它所服务的那种关系，本身就不是旧在籍婚姻——它是一种被除籍之后、被亲自认领、被持续建构的关系形态。这种关系形态的稳定度、满意度、普遍性，目前没有任何大规模数据支持。它只是除籍打开的一个可能方向——而且是众多可能方向中的一个。除籍之后，关系形态很可能是多样的：有些关系走向深度叙事建构，有些关系停留在浅层的功能协作，有些关系选择非婚的共同生活

，有些关系选择独身但不孤独。AI在所有这些方向上都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本文所提出的“协处理器”图景，只是一种可能，而非一种目标或规范。

六、结论：一个发生学事实的命名

6.1 从诊断到命名

下文将分析焦点从“功能替代”“自明性撤出”转移到“除籍”这个发生学事实。以下是本文核心判断的凝缩：

当代婚姻困境的实质，不是其功能被外部技术逐项替代，也不是维持其自明性的社会条件撤出了，而是婚姻作为一项制度，正在经历除籍——从一种被外部结构强行安置的默认状态，沉降为必须由个体亲自认领的选项状态。

本文的核心论证建立在一个基础判断之上：前现代婚姻的自明性，从来 not 来自人们对叙事的“当真”，而来自人们被结构性地剥夺了“不当真”的可能性——来自“不能不信”。是那些由经济互赖、亲属网络、社会时钟和终端句构成的结构性约束，使得“不进入婚姻”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一个不可执行的选择。当这些约束在现代条件下被三重力量——生命时间的个体化、社会网络的收缩、意义生产下放——同步撤除至某个临界点时，“不进入”第一次成为在时间上可推迟、在社会上可承受、在意义上可辩护的事。婚姻的“在籍”状态就此失去其全部约束力。当代关于婚姻的全部焦虑、撕裂与悬置感，都是这个除籍过程中的必然伴随物：当旧的在籍结构已撤而新的“亲自认领”能力尚未建立时，人们陷入论证的焦虑、缺省剧情的中断、仪式中的出戏感、以及善与美的分离。

除籍不是“个体化”理论在婚姻领域的简单应用。个体化描述的是个体从传统结构中脱嵌的过程；除籍描述的是制度本身从“强制默认绑定”沉降为“自由选项”的形态跃迁。这个区分使除籍能够观察到一个个体化理论难以观察到的维度：制度的绑定力的历史变迁——不是“人们不再被动接受命运”，而是“制度不再能绑住那些甚至想被绑住的人”。

生成式AI在这一进程中，不是除籍的原因，而是除籍进程的加速器——它以善的极致降解与美的廉价量产，进一步削弱了支撑悬置状态的两根残柱——同时，它也充当了除籍的暴露装置：以一面高分辨率镜子，迫使人们看到自己关系中的那个不可替代的核是否存在。此外，它也可能成为除籍之后、人类在失去外部脚本的条件下，探索如何建构关系叙事的一种工具——但这条路径只是除籍所敞开的众多可能方向之一，本身不承载任何规范目的。

6.2 除籍的不可逆性与新任务

除籍是不可逆的——在旧网的意义上。那张曾经替所有人做决定的网——生命时钟的强制、亲属网络的兜底、外部权威的终端句——不会自己长回来。拆除它们的力量，就是现代化本身的核心推力，这些推力不会反向运行，因为它们的运作不是摧毁了网，而是替换了网赖以存在的土壤：经济互赖的不可替代性、社会身份的不可选择性、生命脚本的唯一性。地基换了，旧网不可能复原。因此，任何以“回归婚姻的传统自明性”为方向的怀旧方案或修复运动，都不可能成功——它们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否认问题的存在。

但这不排除未来可能出现新的绑定力——新的“籍”。未来的新籍如果出现，它将不会是旧网的复原，而是在新土壤上长出的新结构。本文对除籍不可逆性的判断，限于旧网形态的不可复原，而不切断未来新形态强制出现的可能。

旧网的不可逆，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历史任务降临了：人类第一次需要学习如何在没有任何外部强制兜底的条件下，亲自建构一段足够坚实地承受一生的深度关系。这不是“修复婚姻”，这是一个此前从未被要求过的能力。在籍时代不需要这种能力，因为外部结构替你做了决定。除籍之后，这种能力突然变成了经营一段不被外部结构兜底、却仍能走完一生的关系的必要条件。而这个能力——在没有脚本的情况下共同建构叙事的叙事能力——目前在社会层面，几乎是空白。

6.3 从焦虑到观察：姿态的转换

本文的结论不是“婚姻的出路在哪里”，而是“如果你想知道婚姻正在变成什么，你应该去看哪里”。你应该去看那些站在除籍之后的空地上、正在尝试亲手建造的人。那些不依赖亲属网络兜底却仍选择共同生活的人；那些不靠传统终端句却努力在对话中建构意义的人；那些在技术与关系的交叉地带摸索新可能的人。他们今天的实践是脆弱的、小规模、不被主流文化看见的。但未来万一有一种新婚姻形态被全民继受为新常识，它不会是从庙堂里设计出来的——它将从这些微小实验的竞争中，生出那个被证明最能在新条件下活下去的东西。

6.4 证伪条件：本文的自我约束

本文的核心命题——“当代婚姻困境的本质是除籍，而非功能替代或自明性撤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应当被判定为错误或需要根本修正。

第一，旧网可逆。如果有大量的实证数据显示，当外部结构性约束（经济互赖、社会时钟强制、亲属网络兜底）被重新加回去时，婚姻的稳定度和进入率立即恢复至在籍时代的水平。例如，如果某个现代社会在特定条件下重新建立了“不进入婚姻就无法获得经济安全和社会身份”的格局，而婚姻进入率随即回归全民水平，这就说明除籍不是不可逆的结构性变迁，而只是可逆的外部条件波动。那么，本文对除籍的“不可逆性”判断就需要放弃，除籍这个概念就需要降格为一种“暂时性的结构松动”而非“制度形态的跃迁”。

第二，文化复位。如果在未来十五至二十年内，出现了一场将婚姻重新锚定在“可以不亲自认领”状态上的大规模文化复位运动——不是边缘的怀旧社群，而是真正改变了大多数年轻人默认行为的运动——那么本文关于旧网不可复原的判断就需要修正。例如，如果一种新的宗教或意识形态运动成功地将“婚姻是唯一正常人生”的信念重新植入大多数年轻人的认知中，使他们不再视“不进入婚姻”为一个可承受的可选项，那么这就表明了除籍所命名的那个变迁并非不可逆，而只是一个漫长周期中的一段去结构化插曲。本文就需要承认：旧网虽然不能自己长回来，但可以被人类有意识地重新编织——这将把除籍从“结构性的跃迁”重新拉回“文化信念的波动”这一层次。

第三，除籍可被个体化理论无损替换。如果“除籍”这个概念被证明可以用“个体化”理论彻底替代——即所有被本文归因于“制度的绑定力变迁”的现象，都可以被完全解释为“个体的脱嵌”后果，而没有产生任何不可还原的分析增益——那么除籍就没有增加独立的理论收益，本文的核心贡献就被证否。这具体是指：如果后续研究能够证明，本文所描述的一切“悬置”体验、“善与美分离”、“论证焦虑”等现象，其规模与分布，可以完全由个体层面的社会经济变量（教育、收入、职业、城乡）所解释，而不需要一个独立的“制度绑定力”概念来捕捉在不同个体化程度的群体中共同出现的婚姻制度感知变化的整体偏移，那么除籍概念的不可还原性就不成立。反过来说，如果后续比较研究能够显示：在个体化程度相似的群体中，那些身处“网”的残余更浓的社会环境（如亲属网络仍较强、社会时钟仍有实质约束力）的人与“网”已充分收缩的社会环境中的人，对婚姻的“默认感”和“论证义务感”存在系统性差异——而且这一差异不能完全被个体的教育或收入差异所吸收——那么除籍概念所指向的那个独立于个体脱嵌层面的“制度层变迁”就获得了经验上的独立存在性，而这正是除籍区别于个体化的核心所在。

三种证伪路径，对应本文论点的不同层级。旧网可逆动摇的是除籍的不可逆性判断（3.1节和6.2节）；文化复位动摇的是除籍所命名的变迁是否只是文化信念波动而非结构质变（1.2节和3.3节）；被个体化理论无损替换动摇的是除籍概念的不可还原性本身（2.2节的核心切割）。如果说本文做了什么，它所做的并非给出一个不可动摇的答案，而是在现有证据和逻辑可支持的范围内，提出一个可以被这三条路径中的任何一条所推翻的、锐利到足以推动经验研究去检验的判断。

这正是一个发生学概念应有的形态：它不宣称自己“对”，它宣称自己在更大范围的经验审查到来之前，把一件事说得比以前更清楚。

本文的思考得益于乌尔里希·贝克与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关于个体化的经典论述、劳伦斯·斯通与斯蒂芬妮·孔茨关于婚姻与家庭的历史研究、安德鲁·切尔林关于婚姻去制度化的分析、安东尼·吉登斯关于亲密关系变革的论述、以及齐格蒙特·鲍曼关于液态现代性的诊断。与这些思想传统的对话是本文立论的基础，但文中一切缺陷由作者自负。本文第三部分引用的历史案例基于家庭史领域的既有学术研究成果，第五部分的经验速写基于作者2018至2023年间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进行的初步实地访谈，该材料在本文中仅作思想拓展之用，不构成统计意义上的经验证据。

参考文献

- Bauman, Z. (2003).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2002).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Cherlin, A. J. (2004).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4), 848–861.
- Coontz, S. (2005). *Marriage, a History: From Obedience to Intimacy, or How Love Conquered Marriage*. New York: Viking.
-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ochschild, A. R. (2003).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Intimate Life: Notes from Home and 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Illouz, E. (2007).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2021).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Japan 2021*. Tokyo: NIPSSR.
- Stone, L. (1977).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Swidler, A. (2001). *Talk of Love: How Culture Matt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